

翻译中的文化资本流转

——以理雅各为例

余娟

(广东技术师范学院, 广东 广州 510225)

[摘要] 文章以英国著名翻译家和汉学家理雅各从传教士到翻译家和汉学家的社会经历为契机, 以布迪尔的文化资本理论为框架, 结合译者的社会轨迹和身份变化, 分析理雅各《中国经典》翻译活动中文化资本的流转形式, 探讨译者社会轨迹和身份变迁与文化资本形式之间的关联性。理雅各的身份与其文化资本形式的变化息息相关, 他的社会轨迹和身份的变化影响了文化资本形式, 使文化资本从具体化转向客观化和制度化, 最后向社会资本和象征资本流转。

[关键词] 理雅各; 《中国经典》; 文化资本; 资本流转

[中图分类号] H315. 9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2095-0292(2017)02-0097-03

理雅各 (James Legge) 是出生于苏格兰的近代英国著名翻译家、汉学家。他的一生经历从传教士到翻译家和汉学家的身份转变, 并成功以翻译中国典籍和汉学研究闻名于世。本文以此为契机, 并结合布迪尔社会学理论体系中文化资本这一概念, 将译者的社会轨迹、身份变化, 及其文化资本在不同时期的内部转变相结合, 探讨译者社会轨迹的变迁和身份变化对文化资本形式内部流转的影响和联系。

翻译研究领域对社会学理论的关注始于 20 世纪 90 年代, 其中以布迪尔的理论体系最受瞩目。研究翻译活动中的“文化资本”的国外学者主要有 Sela - Sheffy、Casanova, 以及 Sapiro。Sela - Sheffy (2006) 探讨了从事文学作品翻译的学者如何通过自我公众形象的构建来累积文化资本和象征资本的。西班牙学者卡萨诺瓦 (2010) 分别从主流语言和非主流语言两个方面分析了文学作品在译场中的文化资本特征。Sapiro (2010) 则以象征资本为视角, 分析了出版商是如何操纵象征资本, 从而使法国文学作品逐渐失去其文化资本和地位的。国内学者赵朋 (2006) 论述了翻译过程中文化资本流通的形式。曾文雄 (2011) 以周氏兄弟的《域外小说集》为例, 探讨了译者的“译经意识”与文化

资本流通的关系。上述研究多为针对译者习惯和场域等个别概念, 较少探讨译者文化资本、社会轨迹和译者身份之间的关联和影响。

一、文化资本的定义、分类和特征

布迪尔在他的社会学理论体系中, 将资本定义为“决定社会主体在该社会中的地位和他们社会关系中的相应的分配形式的各种力量” (Bourdieu, 1986)。同时指出, 资本有三种基本类型: 经济资本、社会资本、文化资本。其中, 文化资本是指“社会上各种文化资源 (如教育) 的总和以及社会主体对这些文化资源的掌控和利用能力”, 主要通过教育, 学习等社会活动实现。布迪尔认为, 与资本一样, 文化资本也具有三个特征: 一是再生产。与资本的基本特征一样, 文化资本具备生产和再生产特性, 不仅能为拥有者带来价值, 还能为其创造和生产更多的价值。二是累积性。行为者需要不断地进行社会和文化活动, 并从这些文化活动中逐渐累积文化资本。三是流转性。文化资本可以互相流动和转化。流转的方式有两种: 资本内部的流转以及不同资本之间的流转。前者指的是文化资本内部不同形式之间的转换, 后者指的是不同类型的资本之间的转化。

[收稿日期] 2017-01-15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科青年项目“师范院校英语专业学生语篇能力与口译能力关联的实证研究” (16YJC740083)

[作者简介] 余娟, 广东技术师范学院讲师, 博士, 研究方向: 功能语言学、语篇分析、翻译研究。

布迪尔同时指出，文化资本有三种不同的存在形式：具体的、客体的和制度的。具体形式的文化资本主要是指社会个体的生物性特征，由社会个体的成长环境、生活经历和教育经历决定。客观化的文化资本主要是社会个体通过个人能力所创造的文化产品，是社会个体艺术创造能力的物质化再现。体制化的文化资本则是对客观化文化资本的制度化 and 体制化再现，主要是一种“社会公认性”的权力，使文化资本合法制度化并顺利得以传承和再生产。从文化资本的角度来看，好的翻译作品是译者创造性地产出，能在市场中获得良好的经济效益，从而能使译者得到相应的经济资本，为译者带来积极的社会名誉，给译者创造社会资本，并能使译作具有更多的象征资本。

二、理雅各的社会轨迹及身份变化

我们将理雅各的社会轨迹按照空间的不同大致分为三个阶段：英国求学时期、中国传教时期和英国汉学研究时期（见图1）。一是英国求学时期（1815 - 1839年），理雅各完成从中学到大学的教育，并加入伦敦会同时在伦敦大学学习汉语。在经历了两年的神学训练后，向伦敦传教会申请前往中国传教并获得批准。二是中国传教时期（1843 - 1873年），理雅各担任在马六甲及香港英华学院院长，主要从事传教、教学、翻译工作，直至1867年因病回英国修养。从1861年到1886年的25年间，出版中国主要典籍的译著共计28卷。三是英国汉学研究时期（1873 - 1897年）。在此期间，理雅各离开香港返回英国，开始了执教牛津大学的汉学研究生涯至去世。当我们把理雅各的社会经历与他的身份相对照后就会发现，他的个人社会轨迹与身份变化之间呈现出对应的关系，社会轨迹的改变，促使了译者文化和社会活动类型和性质的变化，使译者的身份发生了转变。通过在中国进行传教、教学、翻译、著书等形式的社会和文化活动，理雅各从一名传教士，逐渐走向翻译和研究的道路。进一步分析后，我们还发现社会轨迹的变动不仅会使译者的身份发生变化，还会促使译者本人的文化资本形式的流变。《中国经典》的成功，使理雅各在身份上从传教士转变为汉学教授，并以翻译典籍和汉学研究闻名于世，文化资本形式也发生巨大的变化。

三、理雅各文化资本流转过程

从图1可以看出，理雅各的人生轨迹、社会身份和文化资本之间存在很强的关联性和对应性，三者之间相互影响、相互作用。译者的社会轨迹的变动，伴随着社会身份的变化，而身份的

变化则会促使文化资本形式从具体化向客观化和体制化转变。也就是说，译者文化资本的流转过程有三个阶段：具体化阶段、客观化阶段、体制化阶段。下面我们将分别从上述三个阶段来分析理雅各在不同时期是如何积累文化资本并创造条件使其文化资本顺利流转的。

1. 文化资本具体化

在布迪尔的理论体系中，具体化的文化资本主要从个体的成长环境和教育学历中获得。从成长环境来看，理雅各出生于英国基督教传教最活跃的地方之一，父母都是虔诚的基督徒，他们从小就希望理雅各将来可以成为一名传教士。同时，理雅各时常在父亲的书房中看到英国传教士米怜寄来的各种中文资料，引起了他对这个遥远国度的好奇之心。因此，在完成小学和中学学业后，理雅各考入了伦敦海伯里神学院攻读神学。为了确保海外传教活动的顺利进行，理雅各师从伦敦大学中文教授修德学习汉语，并基本掌握了这门被欧美学界认为是最为难学的语言。可以说，理雅各虔诚的基督教成长环境以及在学校中受到的良好的神学教育是其初期的文化资本，是理雅各获得传教士资格和进入翻译领域的基础性的文化资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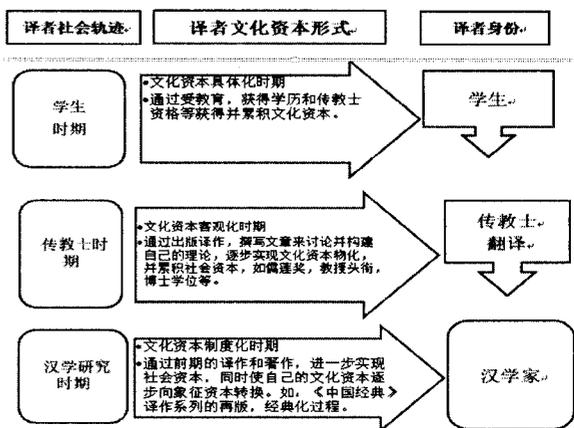


图1 理雅各不同时期身份与资本类型

2. 文化资本客观化

从翻译活动的角度来看，译者的文化资本客观化成果一般就是他们所翻译的作品，以及其他相关的评论或研究著作。在中国长达四十余年的传教生涯中，理雅各出版了大量的译作和著作，并发表了多篇学术论文。同时撰写了多篇的学术论文，探讨中国文化及其术语的翻译问题，为汉学界提供了宝贵的研究资料。他将《论语》的标题翻译为拉丁文“the Analects”，同时英译了“中庸”“天”等术语，获得了在西方学界对中国文化和哲学术语的一种“命名”权，而这样的命名权是获取文化资本的主要途径。除此之外，理雅各还在业余时间为外国人进行汉学答疑活动，为外国人了解汉语及中国文化起着中介性的作用。翻译作品和研究成果的成功出版以及各

种中西交流文化活动的开展, 都使理雅各的文化资本客观化, 并不断得以增长, 获得更多的利益, 同时也为其体制化提供了条件。

3. 文化资本体制化

布迪尔(1993)强调, 文化要想真正发挥符号性作用并代代相传, 就必须使该文化资本拥有“社会公认性”而被确立为体制化的或经典化的文化作品。作为译者, 理雅各文化资本制度化的两个决定性因素是《中国经典》的各卷的不断重版, 及其由此获得的各种荣誉。首先, 译著的重版。香港大学再次出版了理雅各翻译的五卷《中国经典》。近年来, 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古代文献系列译本, 其中《四书》的英译文仍选用理雅各的译文。对《中国经典》的不断重版, 赋予理雅各翻译的《中国经典》一种社会公认的权威性和经典性。我们可以认为《中国经典》译作的经典化过程就是其文化资本体制化的过程。其次, 译者的荣誉。因为翻译《中国经典》的成就以及在汉学研究方面的贡献, 理雅各在1876年被法兰西学院授予首届儒莲汉籍国际翻译奖, 并获得朱利昂奖金的首奖。各种奖项的授予表明理雅各《中国经典》的翻译工作得到社会和学界的“公认力”, 是其文化资本体制化的再现。

四、结语

从传教士到翻译家、汉学家, 理雅各一生经历三次社会轨迹和身份上的变化。本文以此为契机, 并以社会学理论的文化资本概念为理论框架, 从三个时期分析理雅各的社会轨迹变迁和身份变化对其翻译活动中的文化资本形式的影响,

探索翻译过程中译者身份变迁和资本形式流转的关联性。研究发现, 社会轨迹的变迁会引起译者身份的变化, 促使其文化资本首先从具体化转向客观化和体制化, 三种资本形式之间息息相关, 社会学视角下的译者文化资本的研究需要与译者的社会轨迹和身份变化的历时性研究相结合。

[参 考 文 献]

- [1] Sela - sheffy, Rakefet. The pursuit of symbolic capital by a semi - professional group: The case of literary translators in Israel [C]//WOLF, M. bersetzen - translating - traduire; Towards a social turn. London: LIT. 2006: 243 - 252.
- [2] Casanova, Pascale. Consecration and Accumulation of Literary Capital; Translation as unequal exchange. In Baker, M. (Ed.). Critical readings in translation studies [M]. London, England: Routledge, 2010.
- [3] Sapiro, Gisèle. Translation and Symbolic Capital in the Era of Globalization; French Literature in the United States [J]. Cultural Sociology, 2015(3): 320 - 346.
- [4] 赵朋. 论翻译与文化资本流通的关系 [J]. 广西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6(4): 149 - 152.
- [5] 曾文雄. “译经意识”与文化资本流通——以周氏兄弟的域外小说集译本为例 [J]. 西安外国语大学学报, 2011(2): 74 - 79.
- [6] Bourdieu, Pierre. The forms of capital [C]// Richardson, J. G. Handbook of theory and research for the sociology of education. New York: Greenwood, 1986: 241 - 258.
- [7] Bourdieu, Pierre. The Field of Cultural Production [M].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3.

On the Conversation of Cultural Capital in James Legge's Translation of the Chinese Classics

YU Juan

(Guangdong Polytechnic Normal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225, China)

Abstract: Taken James Legge as the example, this paper aims to explore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ranslator's social trajectory, identity and cultural capital. It is found that the social trajectory and identity of James Legge are closely related to his translation activity, which, from the sociology perspective, is regarded as a process of accumulation and conversion of cultural capital. It is the change of social trajectory and identity that led to the embodied cultural capital converts into objectified and institutionalized cultural capital, which results in the increase of translator's social capital and symbolic capital.

Key words: James Legge ; chinese classics ; cultural capital ; capital conversation

[责任编辑 薄 刚]